

民国初期及中期图书馆职业化的 发展与表现(1912—1937)*

□任家乐 刘春玉

摘要 通过职业发展理论,探讨民国初期及中期图书馆职业化的发展进程。认为图书馆职业从没有职业特点的简单工作,逐步上升到具有职业标识、职业学术、职业理论的成熟阶段,图书馆学术理论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批具有共同职业认识的图书馆人借助职业刊物,将职业团体发展成职业共同体,发展出统一的职业诉求,努力使政府及文化界确认其社会地位和独立性。

关键词 职业化 职业共同体 图书馆人 职业学术 职业意识 文化界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8.04.015

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图书馆事业是当时朝野上下有关富国强兵、救亡图存思想的一种体现。由于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并不均衡,直至20世纪20年代,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支持还停留在简单的制度移植,以及少数中央及省级图书馆的建设上。各地图书馆虽建立不少,但各自独立发展,彼此缺少交流。图书馆职业认同及图书馆学理论建构尚未形成,表现为职业进入没有门槛,图书馆缺乏专业性,图书馆界没有独立的声音,这一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还处于“形而下”的阶段。新公共图书馆时期,民间办馆活动再掀高潮,随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的创办,图书馆刊物及著作大量产生,全国性、地方性图书馆协会建立,图书馆职业化得到快速发展,职业认同加速形成。文化界对于图书馆问题的讨论亦趋活跃,逐渐具有职业意识的图书馆人开始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1 职业的定义与初期图书馆职业化

职业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不能简单地认为从事某项工作即为职业。萨尔茨(Salz)认为职业的概念包含三组要件,即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他对职业的定义为:那种具有市场价值,一个人为了使收入源源而来所持续从事的特殊活动;这种活动并且

决定了那个人的社会地位^[1]。萨尔茨强调市场价值,认为职业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公用性,从而将其与家庭劳动、个人行为相区分。就社会学观点来说,职业少不了要从事该职业的各人有相当的团结、相当的同类意识,和一种交互作用,以及社会方面对这些职业中人的承认。职业是团体性的,有种明显的或不明显的意识形态的观念围绕着。在一种职业的参加者方面,则有一种同志意识。所以一种职业实是一种复杂的规范的体制^[2]。职业呈现出丰富的内涵,外在表现为技术、经济、社会地位,内在表现为团体精神、共同意识等内容。

那些尚未成型的职业需要经历职业化的种种阶段发展成熟,这一过程被称为职业化。威廉斯基描述了职业化发展的5个阶段:职业工作的形成——从事某一工作的人们,对其工作内容享有自主的管辖权力;专业教育的设置——从事该行业的人士,设立学校与训练课程;专业学会的成立——以学会力量共同确立职业服务的目标与职业技能的认定;寻求政治的保护——要求立法保障其职业的专属性,并以获取学会证照保障就业市场的独占性;发展职业伦理——建立职业伦理规范,借此剔除不合格的从业人员,实现专业理想^[3]。大体遵循实际工作形成、职业理论产生、团体或职业意识形成、职业伦理

*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ZDB128)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任家乐,ORCID:0000-0002-6850-4745,邮箱:1019339983@qq.com。

形成、国家及社会承认四个阶段。职业化使一项工作最终从依附于他种职业,或者从零散的个体行为中分离出来,摆脱混沌状态而渐具社会认同的标志性特征,从而完成职业塑造。

学界习惯从学术史、学科史的角度来观察这段历史,从单独的人、事、物进行考察。李刚等学者从“范式”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力图从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从“制度”而不是个别对象来解读学科的制度化问题,与本文有相似的思考。毋庸置疑,图书馆学科制度化理论建构和探索,对于提高图书馆职业的专门性和社会形象均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非此,图书馆职业就只是一门谋生手段,上升不到专业。然而图书馆学科史不能等同于图书馆事业史,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图书馆学科制度化必须建立在图书馆职业化获得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因此,虽然图书馆学科发展的诸多要素与图书馆职业化相重叠,甚至可以说引领着图书馆职业化的发展。然而图书馆职业化本身还是一个自我认识以及获得外界承认的过程,图书馆学科发展对前者的重要性要大于后者,而后者还涉及行业利益的保护,争取国家政策及经济扶助等,需要图书馆业自身来证明,不是图书馆学科史所能兼容的。

本文参考程焕文有关中国图书馆事业百年历史的划分^[4],对近代图书馆职业化进行研究。公共图书馆运动时期(1900—1911年)可视为图书馆职业化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图书馆工作开始出现。在接下来的新图书馆运动时期(1912—1925年),图书馆事业另外几个组成部分,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刊物、图书馆协会开始出现,图书馆事业结构趋于完整。在近代图书馆兴盛时期(1925—1937年),图书馆职业专业化和社团化的发展,使图书馆职业完成独立化。

图书馆职业化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展开,早期仿照西方建立的图书馆,可供参考的资料只是一些知识分子通过间接阅读或游历所形成的感性记录。例如郑观应的描述:“(大英博物图书馆)就长案上静看,不许朗读。阅毕,签名书后何日何处何人阅过,缴还经手。该值堂年终查核,知何书最行。另有赁书楼,有股份者,每年出书费四元,可常往看。各处新报俱全。只准借书两本,限两礼拜归还。如无股份者,赁阅,每日计银两先付^[5]。直到公共图书馆运动时期的末段,才零星出现概述性质的西方图书

馆学理论作品。1909年孙毓修的《图书馆》是较早介绍西方图书馆制度的文章,不过仍是杂糅之作。“图书馆之当筹办也,如彼其急,但前此无成典”,所以便“仿密士藏书之约,庆增纪要之篇,参以日本文部之成书,美国联邦图书馆之报告,而成此书”^[6]。同期王国维翻译的《世界图书馆小史》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图书馆技术问题的介绍。早期中国图书馆事业尽管受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影响而产生,然而受到的影响只是来自于模糊概念的传播,还没有专业理论的系统输入。

从早期图书馆员所谓的五花八门也可见职业发展的初期状态。“书籍每日由协理轮查一次,如有损坏遗失等情,须由管书人追根赔补”^[7]。“藏书楼设提调一员,供事十员”^[8]。“本楼立总理一人、监督一人、司书二人、司事一人、门丁一人、庖丁一人、杂役一人”^[9]。直到1910年,官方文件《学部奏拟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摺》第十五条:“图书馆管理员均应访求遗书及版本,由馆员随时购买,以广搜罗”^[10],才开始出现“图书馆管理员”的提法。此后,“图书馆员”才渐渐成为规范的称谓。

由于历史习惯影响等因素,早期图书馆与普通社会民众缺少联系。当时充斥图书馆界的仍是传统知识分子,读者与图书馆员属于同一类人,图书馆虽渐具西方的形式,但图书馆员的思维仍是陈旧的。普通民众没有利用图书馆的愿望,图书馆也没有向普通民众劝诱阅读的动力。

早期图书馆职业化的特点可以概述为,建设了不少面向公众阅览的图书馆,拥有了一批专门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员,职业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职业工作开始形成,然而缺乏职业理论,仍沿袭旧有藏书楼思想,全民共享、图书馆职业理念还未成型,阅读基本仍是读书人的权利,图书馆职业认同尚未萌芽。

2 新图书馆运动时期、近代图书馆兴盛时期职业化的深入发展

新图书馆运动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图书馆职业化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职业学术开始发展,引入了西方的技术和思想,开始了图书馆学中国化的进程,逐渐建立起区别于其他职业的理论藩篱。二是图书馆刊物大量出现,形成职业交流的公共空间,图书馆人通过公共空间交换思想,传递

信息,形成共识。三是职业共同体的出现。职业共同体,是一些具有相同职业,有相近的价值取向和具有特别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所形成的群体。职业共同体往往借助职业刊物、行业协会互通声气。新公共图书馆运动时期,以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国内受图书馆学教育者为主的学人群体开始在图书馆界发挥重要影响,中华图书馆协会就是他们发挥作用的重要舞台,图书馆界的凝聚力明显增强,开始发出统一的声音。新公共图书馆时期职业化的几个重要特点在近代图书馆兴盛时期继续得到发展。

2.1 职业学术的构建

新图书馆运动时期,职业化的快速发展始于职业学术的进步。最初译自日本的图书馆学著作如《图书馆学小识》(1917)、《图书馆指南》(1918)等,使图书馆界有了可参照的范本。“以上二书,实东洋图书馆学流入之代表作。而此时之一般办理图书馆者,亦莫不奉为上法”^[11]。1920年代以后,美国图书馆学理论渐成主流,随之而来的图书馆学中国化,其基础就是西方图书馆学。像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写成于1931年,出版于1934年,吕绍虞的《图书馆利用法》(1924),杜定友的《图书馆》(1926)、《新中华图书管理法》(1932)等,或译或编,某种程度上都加入了图书馆学中国化的成果,改变了西方理论的一些不服水土之处,便于读者运用。西方理论输入从概述类作品向专门性作品过渡,学科专业性明显加强。杜威十进分类法传入后,先后产生20多种的“仿杜”“改杜”“补杜”分类法,还吸引了文化界的注意。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及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学人群体引领了这次运动的发展。程焕文甚至认为,文华公书林就是新图书馆运动的中心和策源地^[12]。

职业学术的发展带有追求职业独立性的意味,如果图书馆职业的一切工作、职业技术、执业人员资格等都能够从另外职业获取的话,图书馆职业就不会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因此图书馆职业学术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使图书馆职业具有可识别性,取得独立地位。耿靖民认为“图书馆事业,虽然已渐渐地为社会所注意,但大多数的人们,还把他当作教育的附属品;却不知道他们是和其他教育机关,立在一个对等的地位的。我们为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计,应当向社会解释,把图书馆事业的内容,和他的重

要,都略略的展献于社会,使社会上的人士,对于他由了解而发生信仰和希望,抛去已往忽视的心理”^[13]。

克乃文与韦棣华在中国开展的图书馆学教育活动,以及不少地区开设的短期图书馆学教育工作,推动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造成了图书馆学为专门之学的氛围。中国图书馆学的中坚分子接受了美国图书馆学理论,大力推广公共图书馆,注重向民众推广阅读,使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发生了重要改变,日渐形成了一批有共同理论基础、共同职业认识的图书馆人,生发出创办专业期刊及图书馆行业组织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图书馆学人反对那种认为速成教育可以取代专门教育的观点,相反,优秀的图书馆员对自身素质要求很高,需要大量时间才能培养出来。沈祖荣等认为,那些速成教育如讲习会里的学员,不少只是抱着挣学分的目的来参加,并不是对图书馆学真正感兴趣^[14]。这种态度不仅对图书馆学科不尊重,容易导致社会的错误认识,还会对图书馆职业化造成伤害。

“师范学校,或师范专科、大学教育学系,偶尔设置了一两项图书馆课程,于是有人误解以为学习图书馆学,能如此便足够了;又以为办理学校图书馆,不必聘用图书馆专门人才,只须派定这类曾受几点图书馆课讲授的教员充当,便可以胜任愉快了。要知道这又是不切事理的打算呢。我们只认为师范生受图书馆课,是可以辅导学童们如何使用图书馆和书籍,而不能认为他们可以代替学校图书馆专门办理人员的职任。关于训练学校图书馆馆员,仍是正式图书馆专门教育里面高深部门之一项。……最末,我们只要说一句,任命一个学数学的去担任学校图书馆的事务,和任命一个学图书馆学的图书馆员去教数学,一样是荒谬无理的”^[15]。

杜定友也认为“以前,我们对于图书馆学速成班、讲习所、函授学校都非常赞成,以为可以普及。有一次,一个图书馆讲习会的先生说‘听他讲演一星期,便可以成为图书馆专家,于是大家趋之如蚁赴毡,这叫做图书馆学民众化。’唉,这位先生错了。图书馆是民众化的。而图书馆学是万万不能民众化的,这种自杀政策,我们该明白了”^[16]。

不可否认,短期培训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然而对于快速普及图书馆员基本技能教育,提高图书馆

职业的专门性仍有积极意义。

2.2 公共空间——图书馆刊物的出现

公共空间是社会学的一个概念,指现实或虚拟的供人们交流思想的空间,介乎公、私以外的领域,图书馆刊物及图书馆协会就属于这样的领域。图书馆刊物的目的通常有:联络读者,宣传馆藏;图书馆之间业务交流、学习观摩;研讨图书馆学术;宣传图书馆的价值、推进社会教育等,这些工作都是围绕图书馆开展的。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刊物基本采取赠阅的发行方式,与图书馆迫切需要扩大宣传、获得社会认同有一定联系。这些刊物对外利于塑造图书馆的职业形象;对内则是互通信息、交流学术、培养职业认同的公共空间。

图书馆刊物还是图书馆职业发展的参照。1915年《浙江公共图书馆年报》是最早创办的图书馆刊物^[17]。早期的图书馆期刊内容较为事务化,以馆务报导为主,理论气氛不浓。“将平日同人等所评论者,商榷者,以及一切工作记录,汇而刊之”^[18]。1920年代以后,以《图书馆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文华图书馆学校季刊》为代表的图书馆刊物,开始带有明显的理论研究风格,最新的研究成果往往以刊物论文的形式出版。《图书馆学季刊》的发刊词就说:“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

图书馆人借助图书馆刊物探讨共同职业精神,以形成图书馆人的职业价值观。如奋斗精神的提倡,陈长伟认为“吾人(图书馆人)本奋斗有为之精神……则未有不能成者也”^[19]。沈祖荣认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皆欲驰骋乎宇宙之内,不限于其本地本国已也。抑有进者,欧美外人于东方文化且若此,我国为东方文化之代表,独不思所以振兴之乎?”^[20]如坚韧精神的培养,杜定友认为“图书馆学术与事业本身,是极富有兴味,不过这种兴味与趣旨,要自身去领悟,去追求,而不可以由外物诱致的。”“(图书馆员)职责很重,范围很广,于是刻苦奋斗以求打破恶劣的环境,增进图书馆的效用,孜孜以求,数十年如一日,淡泊宁处”^[21]。再如服务精神的宣传,李小缘认为“(图书馆员)应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自认为人民公仆”^[22]等等。

图书馆为公益性质的职业,其收入较教师为低,社会地位不高,职业晋升空间有限,职业的特殊性使

职业气质、职业精神的形成尤为重要。图书馆刊物是当时大多数图书馆互通声气的有限方法,图书馆人有关职业精神的讨论,对整个职业产生无形的影响,有助于真正适合图书馆工作的人沉淀下来。

2.3 职业共同体——图书馆协会的出现

图书馆协会是图书馆人为维护和增进图书馆人的权益而自发组成的团体。图书馆协会的出现标志着图书馆行业组织形成,并能够以集体形式与政府及社会各界交涉,争取图书馆人的利益,克服单个图书馆或个人无法达到的目标。

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形成一方面使职业同人深感联络的必要,另一方面可以说是理论建构的需要,需要一个机构来统筹规划,“近虽取法欧美,颇有设施。顾尚馆自为政,不相闻问,将收远效,实待他山。同人服务典藏,行能无似,深苦观摩乏术,商榷莫由。兹经共同定义,请集全国图书馆及斯学专家为中华图书馆协会”^[23]。

中华图书馆协会希望规范行业标准,替代各图书馆标准不一、各行其是的状况。“国中图书馆近既林立矣!而应用专学以管理之者,盖尤鲜例。如各馆之内,设备必如何而后周;组织必如何而后当;利用藏书之道,何似而宜;启发社会之方,何似而可。以至通乎全国,宜如何分布设置,调剂经费,皆讨议规划,不厌精群。同人无似,爰有中华图书馆协会之组织”^[24]。1929年第一次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提案中就有“规定全国各省立各县立图书馆标准法令案”“请教育部颁布设立图书馆标准案”“省县市立图书馆设立标准案”等,行业规范化为年会热点之一。提案人认为“各地方皆有筹设图书馆之议,倘无标准法令,则各自为政,将不免有畸形发展之弊”“有标准则管理图书馆者有所根据,办理合法,易有成效”^[25]。

图书馆协会还是为图书馆业争取政府支持、争取图书馆员利益的机构。以呈缴制为例,1929年第一次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相关议案就有:“政府刊物每次出版时宜分赠各图书馆以备参考”“请国民政府分赠政府各机关之公报及一切政府出版品于各大图书馆并指定中央图书馆编造政府出版品目录案”“请国民政府整理前北平政府各机关旧存出版品分赠各图书馆案”等。图书馆职业不仅需要政府管理,需政府扶助,相比其他职业,与政府关系更为密切,因此要求各地政府、教育部门予以扶持的议案特别多,如“请建议国民政府减轻图书馆寄书邮费案”“呈请教

育部令各书坊凡有图书馆正式函件及图章一律优待出售案”“由本会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大学及教育厅聘请图书馆专家指导各该省图书馆一切进行事宜案”等。

关于图书馆员权益,主要集中在待遇、用人等方面,如通过案“图书馆协会得请全国图书馆对于雇佣职员应聘有图书馆学识及宏富经验者至于职员之位置务须有确实保障须予以优良待遇案”,就是由九条提案合并而来,“目下图书馆服务人员待遇甚为清苦,亟应提高以养成其专业化;图书馆为专门事业,办理者须有学术上相当之智识及专门之技能,非一般人之所能从事者,故其待遇应稍较优异,以鼓励及吸引专门人才^[26]。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来提高职业吸引力,留住高素质人才也是中华图书馆协会历次年会的热点之一,目的就是要用一定的待遇来保障职业化。又有“图书馆应多用女职员案”等,图书馆学人大多认为女性较男性更适宜图书馆工作,在当时男性在就业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这一提案反映了图书馆职业化的发展方向。

图书馆人特意加强职业的社会可识别性。如大会通过的杜定友所提采用“圖”新字案,“办法”要求“凡本会之出版品,概用此字。凡本会之通告,及会员来往书札,概用此字。通告各圖,尽量采用此字”^[27]。使“圖”字成为图书馆对外的商标。又有南开大学图书馆针对书商滥用图书馆三字的做法,提出议案“书店不应号称图书馆案”,理由是“坊间书肆,不明图书馆三字之意义,因而袭用,以致难于区别,殊不合宜。”因此“由协会议决呈请政府转飭各地社会局,嗣后凡书肆立案时,禁用图书馆字样”^[28]。

3 图书馆界与文化界、出版界的不同看法与影响

随着图书馆职业化的发展,图书馆界与文化界、出版界的分歧增加,图书馆人对文化界非专业性的干涉颇有看法,同时又对出版界提出一定主张。这些主张反映了图书馆职业化的深入。

3.1 发展方向的分歧

1925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演讲辞,是新兴图书馆学人与传统文化界的一次明显分歧,梁启超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多有交集,然而他本身还是文化界的主要代表。梁启超的这次演讲,明显针对鲍士伟刚刚结束的在华巡回讲演。

“我们绝对的承认群众图书馆对于现代文化关

系之重大,最显著的成例就是美国,我们很信中国将来的图书馆事业也要和美国走同一的路径,能发挥图书馆的最大功用。但以中国现在情形论,是否应从扩充群众图书馆下手,我以为很是一个问题。……现时的中国怎么样呢?头一件,就读者方面论,实以中学以上的在校学生为中坚,而其感觉有图书馆之必要最痛切者,尤在各校之教授及研究某种专门学术之学者,这些人在社会上很是少数。至于其他一般人,上而官吏及商家,下而贩夫走卒,以至妇女儿童等,他们绝不感有图书馆之必要,纵有极完美的图书馆,也没有法儿请他们踏到馆的门限。这种诚然是极可悲的现象,我们将来总要努力改变他,但在这种现象没有改变以前,群众图书馆无论办理得如何完善,我敢说是白设罢了。……事实既已如此,所以据我的愚见,以为:美国式的群众图书馆,我们虽不妨愚为将来目的,但在今日若专向这条路发展,我敢说:他的成绩,只是和前清末各地方所办‘阅书报社’一样,白费钱,白费力,于社会文化无丝毫影响。……然则中国今日图书馆事业该向那条路发展呢?我毫不迟疑的提出答案道:一、就读者方面,只是供给少数对于学术有研究兴味的人的利用。纵使有人骂他是‘贵族式’,但在过渡时代,不能不以此自甘”^[29]。

梁启超的演说,不仅代表了文化界不少人士的看法,也代表了相当部分以传统知识分子为主的图书馆人的观点。这种观点,简而言之就是“需求决定论”。然而他们并未意识到启发民众需求的重要性,图书馆不仅是提供“高深学术资料”的必要设施,还是公众获取一般信息的媒介,开展民众教育的重要机构,只是这种需求急需图书馆人来唤起,而不能认为这个需求不存在;他们也未意识到这一时期出版界不断发行简明读本、插画读本等降低阅读门槛的进步,这种进步意味着图书馆的消费群体正在扩大;而同期广泛开展的识字运动,一批社会精英如晏阳初、卢作孚等不断向底层民众推广社会教育的努力,已经开始取得成效,因此梁启超的观点已经落后于时代。

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必须有足够的社会需求才能更好地证明图书馆业存在的必要性。仅仅满足少部分读书人的需要,对于图书馆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要推进职业化,就要促进社会需求,两者是对应的。正如沈祖棻所言:“识字运动,民众教育,乡村教

育等,都是注意到教育以普及民众为前提,因之围的工作,亦往民众方面开发”^[30]。在1929年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上,多个涉及公共图书馆发展的议案通过,例如“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县广设民众图书馆案”“各省立县立图书馆应设巡回文库案”“请各图书馆设立流通借书部以普及案”“请各公共图书馆充分购置平民常识图书并以相当宣传简便方法俾资普及阅读案”“设立乡村图书馆以为乡村社会之中心案”等,成为年会的重点主题之一。在1933年第二次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通过案中,又有“请本会通函全国各围注重民众教育事业案”“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县在乡村区域从速广设民众围案”“建议中央通令各省于各宗祠内附设民众围案”等,延续了上届年会的热点。

以李小缘所提“各省民众图书馆经费当与学校教育同等看待案”为例,他认为“民众图书馆乃全民众自动求教育之机关,非若学校教育,仅为少数人之教育,故最低限度应与学校教育受同等之看待;学校教育有年龄程度时间与兴趣职业及经济上种种之限度,而民众图书馆则无。且其功用效能更较学校教育重大,故最低限度应与学校教育受同等之看待”^[31]。其解释就是对梁启超观点的有力回应。

3.2 对出版业的看法和主张

出版业是图书馆业的上游行业,图书馆业的发展要晚于出版业。在图书馆职业化尚未成熟以前,出版界依照各自惯例出版,很少咨询图书馆的意见。出版界人士也参与到正在发展的图书馆的技术问题的讨论,通过出版的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1920年代以后,渐具独立性的图书馆界对于出版界的种种不谐之处提出不同看法,可以分为对现有做法的质疑以及提出新的建议两方面。

图书馆人与王云五围绕图书馆技术展开的讨论可视为图书馆职业学术独立性的体现。1929年开始发行的《万有文库》,因商务印书馆的巨大影响获得极大成功,主要销售对象就是图书馆。《万有文库》采用了王云五自创的《中外统一图书分类法》及《四角号码检字法》,其出发点是好的,然而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把采用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制定的分类号印于书脊,强行替代其他图书分类法,目录卡左上角也直接印刷分类号,对于采用其他分类法的图书馆造成了诸多不便等。

20世纪20年代,杜威十进分类法传入中国后,

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兴趣,不少人粗通大意就开始“创造”,这些自创的分类法往往经不起推敲,甚至会引起图书馆界的混乱,降低社会对图书馆学术的评价。金敏甫就认为王云五自创的分类法存在分类编目混为一谈、技术设计粗糙和矛盾、概念混淆等许多问题^[32]。这些评论并非只针对出版界,对于其他一些分类法,比如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学生曾对陈伯遼的中外一贯图书实用分类法也提出了强烈质疑。显然,图书馆人在讨论这些技术问题的同时,隐含了对非专业人士插足图书馆核心领域的不满,这里说的非专业人士,既包括了图书馆界以外的,也包括图书馆界以内的。杜定友曾说:“我要办一个机械化的图书馆。不懂得图书馆学的人,休想摸一摸,否则,轧断手指头”^[33]。

因为王云五的统一分类法直接涉及图书馆的核心领域,因此对其的争鸣显得较为著名。此外,还有一些出版界的惯例给图书馆界带来了困扰,影响到了图书馆工作,也属于对图书馆规则的干扰。

杜定友的《出版界与围》、沈祖荣的《图书馆所希望于出版界的》这两篇文章代表了图书馆界对出版界通行惯例的看法。杜定友认为,出版界、教育界和图书馆界有密切联系,图书馆因为直接面对读者,图书馆人的意见对于出版很有价值。然而出版界长期忽视图书馆的意见,“现在出版的书,有许多经名流所审定的,但是名流并非学术专家,仍不免‘中国人万能的弊病’,此后应注重实际,免除虚伪”^[34]。又如图书馆因流通和收藏的需要,往往购书时每书需要两本以上,出版界虽则给予图书馆书价折扣,但往往规定每书一本为限,“因为规则所限,只得分次购办。于是手续上,平添许多麻烦”^[35]。而且出版商给予图书馆的折扣要低于同业折扣,这也是极不合理的。至于出版界发行薄本书籍和软本书籍时,因为不能竖立而给图书馆带来麻烦;将版权页印在书籍底封面上,未给图书馆粘贴书袋留下空间;用蓝布书袋,造成图书馆员不能在上面写字等诸多弊病。均为出版界不重视图书馆调查,率性而为的结果。这些惯例并非针对图书馆,但至少没有考虑到图书馆的需要,因此需要调整。

从第一次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议案来看,多有关于技术问题的提案,如“通知书业于新出版图书统一标页数法及附加索引案”,称“旧籍页数向以一卷为起讫,一册有数卷者,前后页数每不相接。新书亦

有犯此弊者,杂志中尤为纷乱,或以每栏为起讫,或以每篇为起讫,形势既欠整齐,检阅及编制索引均感不便。……欧美对于发刊图书而不附索引者,反对之声时有所闻,甚或创议向国会提案,凡刊行书籍而不附索引者夺取版权”^[36]。又如于震寰提的“出版物须分洋装平装两种装订发行案”,认为“然图书馆皮藏图书,不但欲垂永久,且须经无数人之翻阅,平装者易于损毁。倘能购得洋装本,不但此弊可免,且于出纳亦甚便利。故出版商每出一书,必须酌备洋装本若干,特供图书馆之采购”^[37]。

而有些议案如“建议书业共同合作编印全国出版图书目录案”,则是从图书馆业与出版业共同利益出发的建议。“查欧美及日本出版界每于一定之时期内,印行全国出版图书目录一次,如美国之《美国图书目录》(U.S. Catalog),《书目》(Booklist),英国之《参考目录》(Reference Catalog)日本之图书分类目录。不仅便于圉及购书者翻阅,且于出版界之本身亦有莫大利益”^[38]。沈祖荣还专门撰文《图书馆所希望于出版界的》,陈述图书馆界的主张,对出版界的诸多不足提出意见,比如“在国内出版界最不明了之处,就是不知初版再版为何,国外出版物初版再版,有很大区别。初版毋庸解释,所谓再版者,不是第一批销尽,再复印发售为再版,乃是再版须经著者另有修改,能增削初版原意之所未及,所以再版之功用,必远胜于初版。在我国因初版与再版之不分,图书馆购为复本者,为此费钱不少”^[39]。

4 结论

当前对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史的研究,学界习惯从人物史的角度,以总结历史贡献的方式来研究某个学人、某个机构、某个事例;而从职业化的角度探讨图书馆职业的发展,使我们可以脱离“功绩评介”“个人英雄主义”的研究范式,从职业进化的规律来看待图书馆职业的演变。

近代图书馆职业的发展,使图书馆职业从简单的一份工作,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图书馆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并在1930年代渐为成熟,形成了区别于其他职业的专业理论、学术术语、职业理念、职业标志,完成了职业独立化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图书馆事业发展扩大化、普遍化是基础,专业学术传入及其中国化一直起着引领作用,而具有共同理论基础,特别是具有共同职业价值观的一群图书馆学人,

尽管人数甚少,但在职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图书馆学教育、职业刊物、行业组织的建立,使图书馆事业的结构最终趋于完整。而共同职业认识的形成使新兴图书馆人逐步确立了图书馆职业学术的核心领域,不再接受文化界的随意干涉,开始表达出自己的意志。

参考文献

- 1 泰勒(美).职业社会学[M].张逢沛译.台北:复兴书局,1972:7.
- 2 同[1]:7-8.
- 3 叶至诚.职业社会学[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146.
- 4 程焕文.百年沧桑 世纪华章—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回顾与展望[J].图书馆建设,2004(6):1.
- 5 郑观应.盛世危言.//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86.
- 6 钱维均.西方图书馆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6):44.
- 7 苏学会简明章程.//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102.
- 8 京师大学堂章程(节录).//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106.
- 9 徐树兰.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文(附:古越藏书楼章程).//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114.
- 10 学部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摺(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摺).//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109.
- 11 金敏甫.中国现代图书馆概况[M].广州图书馆协会,1929.
- 12 同[4]:4.
- 13 耿靖民.发刊词[J].文华图书科季刊创刊号,1929(1):2.
- 14 沈祖荣.谈图书馆专业教育[J].湖北教育月刊,1935,2(4)://沈祖荣.沈祖荣集[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281.
- 15 同[14]:282.
- 16 杜定友.我与图书馆学.//钱亚新等.杜定友先生遗稿文选[M].南京:江苏图书馆学会,1987:31.
- 17 张敏.中国近代第一份图书馆馆刊——《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述评[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1(26):35.
- 18 发刊词[J].北京图书馆协会会刊,1924(1):2.
- 19 陈长伟.小图书馆组织法[J].图书馆学季刊,1928(4):507-523.
- 20 沈祖荣.参加国际图书馆第一次大会及欧洲图书馆概况调查报告[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9(3):36.
- 21 杜定友.圃迷[J].图书馆学季刊,1933,7(2):401.
- 22 李小缘.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J].图书馆学季刊,1926(3):375-396.
- 23 中华图书馆协会缘起[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1):3.
- 24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宣言[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1):3.



- 25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 [C]. 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99—100.
- 26 上海图书馆协会等.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C]. 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117—118.
- 27 杜定友.采用“圃”新字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C]. 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95.
- 28 南开大学图书馆等.书店不应号称“图书馆”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C]. 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93.
- 29 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N].晨报副刊, 1925.1202.
- 30 沈祖荣.圃所希望于出版界的[J].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1933(2):134.
- 31 李小缘.各省民众图书馆经费与学校教育同等看待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C]. 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 1929:124.
- 32 金敏甫.评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J].图书馆季刊, 1929(1—2):63—68.
- 33 同[16]:65.
- 34 杜定友.出版界与圃.中华书局图书月刊,1932,6/7:8.
- 35 同[34]:12.
- 36 万国鼎、李小缘.通知书业于新出版图书统一标页数法及附加索引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C]. 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93.
- 37 于震寰.出版物须分洋装平装两种装订发行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C]. 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96.
- 38 陈颂.建议书业共同合作编印全国出版图书目录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C]. 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33:68.
- 39 同[30]:134.
- 作者单位:任家乐,成都大学高等研究院,成都,610106
刘春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610064
收稿日期:2017年5月21日

Library Profess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Manifestation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37)

Ren Jiale Liu Chunyu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career development and studies the library professionalization process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which library profession goes from simple work with no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its mature period with remarkable vocational identity, academic scholarship and professional theory. Theories concerning library science are the key points. Through professional public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librarians forms vocational community and expresses their appeals so as to gain professional independence and status and be recognized by governments and cultural circles.

Keywords: Professionalization; Professional Community; Librarian;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Professional Awareness; Cultural Circles

(接第 73 页)

The R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 MOOC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y

Ji Yukuan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library's new mode of Internet plus remot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MOOC can't be supported by the fair use and statutory license rules of copyright law in the period of traditional and network, due to the MOOC's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ng mode.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revising statutory license rules from providing to the enrolled students to providing to the public through information network, as well as correctly reflecting the library's demands for exception to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 the MOOC transmission in order to obtain the appropriate immunity,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OC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y.

Keywords: University Library; MOOC Services; Fair Use; Statutory License